

贵州省政协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三卷】

●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省政协

文史资料

【第三卷】

●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稿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贵州省政协文史
与学习委员会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12

ISBN 7-221-07226-4

I. 贵... II. 政... III. 文史资料—贵州省
IV. K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8283号

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550002)
责任编辑 陈茂荣
封面设计 张世申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32 889×1194 毫米
字 数 1200 千
印 张 44.1875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7226-4/K·921
定 价 100元(三卷)

目 录

经济卷

- 缅怀朱启钤先生 牟应杭(3)
- 长河万古 斯堂万古 程明芷(7)
- 贵州士绅抵制法人修铁路记 金峙青(14)
- 实业家刘若遗 岑明英(17)
- 贵阳市商界前辈戴世隆 金培忠(23)
- 艰辛开办贵州工业的伍效高 王 伦(29)
- 贵州农林学堂略历 刘 勋(31)
- 贵州金融机构与地方政治关系的回忆 朱梅六(36)
- 民国初年黔东邛水河流域造林护林记 李光厚(42)
- 帝国主义欲在贵州修筑铁路小史 陆韞山(46)
- 辛亥以后黔东各县之屯田问题 丁位松(48)
- 王家烈与何键 万式炯(69)
- 工商实业家刘熙乙 刘裕远稿 唐斌整理(75)
- 近百年来贵州娼妓的形形色色 蓝克安(87)
- 解放前贵州银行概况 袁树三(94)
- 1925年至解放前夕贵州禁烟的历史演变 李光璠(103)
- 贵州汽车运输的起源及商车的营运概况 钟大亨(108)
- 贵阳市中、小学生抵制日货与奸商的一场斗争 贾功台(115)
- 解放前贵州税收概况 龙之鸿(118)
- 刘熙乙组织“速富团”经过 赖永初(126)

| | |
|----------------------|-----------------|
| 中国蚕桑研究所在遵义艰苦创业 | 高守仁(136) |
| 中统贵州调统室内幕 | 何 群(143) |
| 对旧邮政的一些回忆 | 陈汉明(151) |
| 中国机械厂和省临工委在龙里 | 张维忠(160) |
| 贵州普定县肃清私存烟土的一幕 | 王心镜(165) |
| 聚康银行简史 | 张文骏(166) |
| 惠水黑糯米史话 | 吴邦琮(173) |
| 黔南事变中都匀灾民的快邮代电 | 都匀全体灾民(178) |
| 黎平铲烟惨案的经过 | 杨春口述 黄德普整理(181) |
| 一批军用棉布的交接 | 岑明英(189) |
| “贵州战后记者访问团”琐忆 | 胡 骑(191) |

文教卫生卷

| | |
|-------------------------|------------------|
| 兴义笔山书院 | 张兴智(203) |
| 贵州实业教育的先驱者黄干夫 | 汪汝衡(207) |
| 贵州省立师范学校首任校长尹笃生 | 萧子有(210) |
| 回忆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 | 刘 勋(221) |
| 清末的贵州官立两级师范学堂 | 魏幼安(228) |
| 贞丰女子学堂创始人孟润芳 | 黄友群(231) |
| 任可澄与贵州文教事业 | 龙之鸿(235) |
| 贵州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沿革 | 宋述湘 夏骏声 谢伯元(239) |
| 贵州省立女子师范的创办人周步瑛先生 | 陈明仙(247) |
| 怀念中学校长刘守一先生 | 龙之鸿(259) |
| 乐嘉藻传略 | 石国梁 时宏深(264) |
| 高等法官谢况 | 余显灵(268) |
| 张镜影教授简介 | 谢明权(270) |
| 吴道安生平简述 | 杨德燊(272) |

目 录

| | |
|------------------------|----------|
| 戊戌政变后回贵阳的李端棻 | 殷亮轩(275) |
| 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 | 刘朝明(277) |
| 商文立先生简介 | 冷开晟(283) |
| 张志韩先生生平 | 钱定权(285) |
| 一生为音乐事业奉献的音乐家魏岩 | 姜菊逸(290) |
| 知名中医石玉书 | 李访明(294) |
| 民国初年我经办的贵州教育 | 桂百铸(297) |
| 贵阳私立导文中学概况 | 黄乾堃(301) |
| 我在大夏大学任训导长 | 傅启学(308) |
| 抗战期间在贵阳的国立第一华侨中学 | 区作霖(313) |
| 国立贵州师范在榕江片段 | 吴志高(321) |
| 四十年代贵阳新闻出版界概况 | 黄 炜(325) |

民族宗教卷

| | |
|---------------------|--------------------|
| 土司制度在罗甸的兴亡 | 王振中(347) |
| 威宁的土司制度与我的经历 | 马 昆(356) |
| 兴仁鲁础营土司的兴衰 | 马达冲 张盛昌(367) |
| 侗家人姚复珍独资修路 | 吴国权 刘逢春搜集(373) |
| 习水县二郎坝天主教发展概况 | 张睿哲(380) |
| 我所知道的昌明和尚 | 倪如锡(389) |
| 基督教传入威宁赫章 | 王明道 李朝阳 龙宪良增补(393) |
| 杨森派员进驻石门坎教区 | 费良才(407) |
| 后记 | (410) |

经济卷



缅怀朱启钤先生

牟应杭

朱启钤，字桂辛，晚号蠓公，祖籍贵州紫江（今开阳），1871年（清同治十年）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终年94岁。他3岁丧父，幼年寄居于外祖父家。稍长，得其姨父清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机的资助提携，早年即进入仕途，于清末历任江苏候补知县、京师巡警总厅厅丞、津铁路督办等职。辛亥革命后，入阁参与政事，特授中卿（旧时授予高级文官的虚衔），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等职。民国2年（公元1913年）兼代国务总理。第二届国会期间，他以参议院副参议长身份，为北京总代表与孙中山先生的代表唐绍仪进行南北会谈（唐原任袁世凯国务总理，1917年参加护国，1919年代表南方与朱在上海谈判）。后受聘为英、意、比、德、美、日专使，出国考察。朱先生早在青壮年时代即以宦途显达知名于世。但他毕生致力的主要是振兴中国的实业和从事撰述与图书的收藏整理工作。他于欧美考察回国后辞官，在山东的峰县（今枣庄市）经营中兴煤矿和中兴轮船公司；又首创研究中国古建筑学的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士能、瞿宣颖等都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他们广征文献，详加考定，出版中国古建筑学的专著30余种。对北京李明仲的《营造法式》（为当时中原地区官式建筑的规范，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有重要参考价值），先生尤多研究。他一生建树较多，曾主持京师警察市政修建四川云阳大盘子新滩工程和山东黄河濰口桥梁等工程；在保存图书文献资料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他是当时北

京著名的收藏家之一。由于他祖籍贵州,因此对有关贵州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尤为重视,曾编印《黔南丛书》别集8种,辑录贵州名人碑传石刻若干卷。解放以后,他将所藏全部图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我拜识朱老先生是在1960年的夏天。那时我正在北京中央文化学院学习(任务是集体编写《中国博物馆学》和《中国考古学通论》两书),贵州的谌志笃先生亦在北京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学习(谌是织金人,当时为贵州参事室参事,早年在南开与周恩来同学,并同为南开学生会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谌曾作秘书)。一天,谌志笃先生通知我说:“朱桂老找你有事相托,望即与他联系。”于是我便按约定的时间到了北京市朱老的寓所。那时朱老虽已90高龄,但仍精神矍铄,他对我说:“我虽是贵州人,但我和我的父亲都从未到过贵州,乡土故情难忘,很想在这即将辞世之年,对贵州略尽桑梓之谊。”他了解我当时学习单位的负责人和给我们上课的不少老师都是文化部的领导(如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齐燕铭,艺术局局长周巍峙,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副局长李长璐等,黄洛锋同志就是我们的院长),他希望能通过我向我们学院的领导反映他的要求:将他捐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中的黔人黔宦的著作转交贵州。他认为将这批图书转给贵州,比留在北京作用大。并再三嘱咐,要我这个年轻人完成这一任务,了却他晚年心愿。

返回学院后,我即将朱老的这一要求面陈院长黄洛锋同志。那时办事效率很高,不到一个星期,文化部图书管理处的同志通知我:他们已与北京图书馆联系好,朱启钤先生有关黔人黔宦的这部分图书,可以转交贵州,但没有两种以上复本的仍保存北京图书馆,其中珍善孤本,给贵州缩微胶卷复制品。此事办妥后,我即将北京图书馆备转交贵州的这部分图书的书目,交贵州省图书馆。后由当时任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的李景仑同志去北京办理接收手

续。李赴京时，贵州省文化局局长陈杰同志，还要他带去贵州大方的漆器和茅台酒、刺藜酒等贵州特产礼品去拜望朱老，以示对朱老关怀桑梓的慰勉之情。对此，朱老十分高兴，曾将他自己出资印刷的一部《黔人诗集》送我，并曾邀我到北京西部中苏友谊大厦（今北京工业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就餐。现在朱老捐赠贵州的这部分图书，经贵州省图书馆分类编目整理，分作经籍、史乘、地志、文学、艺术等 15 门类。有的还是朱老的亲笔抄本。100 余种缩微胶卷的复制品，也可得以阅读和使用，是研究贵州古代政治、经济、历史及地理沿革和文学艺术的一宗珍贵的史料。

朱老的桑梓之情是很深厚的。1961 年 12 月 7 日，他请周总理作客，据说就是由家里人做了几样贵州风味的菜作招待，以示他对总理的钦敬景慕之情。

1962 年我从广州去北京，再度得见朱老，当时他精神虽好，但听觉已不如前，有时我们只好借助笔谈。但他仍桑梓情深，不时向我打听贵州的生产生活和乡土民情。记得他询及早已故去的牟贡三先生，并问是否我的本家？我说：“幼时虽曾听祖辈提谈过这位老人，但与我们一支是什么关系全不知道。”他要我回到贵州后打听一下牟贡三先生后代的情况。后来我得知当时在中共贵阳市委工作的牟开寿同志是贡三老人的裔孙，便将这一情况及时写信告诉了他。

朱老对青年人的进步也是关心的。记得他曾告诉过我，他对古建筑学感兴趣，首先是从研究建桥工程开始的。因为他的父亲是有一次在泯河过跳磴时落水死的，他对此十分悲痛，便决心要探讨建桥工程。他说：“往往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引起你对某一事情发生了兴趣，这千万不要忽视。”由于那时我尚年轻，对朱老这一龟勉后辈的启迪开导之言，理解不深。至今思之，一个人从事某一职业或对某一学科的探讨，往往是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激发起来的。如果你对此不是“浅尝辄止”，而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踏

踏实实地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总是会有收获的。

在我与朱老的接触中，他虽然曾亲笔给我写过信，并曾将他晚年拍下的一帧4寸半身相片题字送我；但由于他毕竟年事已高，搦管作书已感吃力，故多数通信则是由其哲嗣朱海北先生及海北夫人周季藏先生代笔。1964年6月，我到北京观摩全国现代京剧会演，那时朱老已辞世3月，周季藏先生乃将朱老治丧集印的讣告、挽联的册子送我留为纪念。

解放后，国家以爱国民主人士优遇朱老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病终，周恩来总理亲到寓所吊唁。

长河万古 斯堂万古

——贵阳“同济堂”中药店百年简史

程明芷

贵阳市“同济堂”中药店是贵州历史最悠久的中药商店之一。它始建于清朝光绪十四年，至今整整 100 年了。

百余年前，省城贵阳，经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都极其落后，民众生活较贫，迷信很深。生了病，病情轻就硬撑着，病重了则乞灵于鬼神：请端公念咒，巫婆跳神、烧蛋、放血。市上偶尔有摆药摊贩，或挑着草药窜街的，加上一些并不高明的推、捏、刮、针灸等，欲治重病，情况是可想而知的。那年月，多种疾病的流行，不仅百姓遭殃，就是达官贵人，虽有条件请来中医，施以针砭药醴，但由于市面上药物品种不多，药材真伪混杂，患病后亦难治愈。

中法战争后，一些贵州籍的在外省的官员退出了官场，曾任太子少保巡抚銜、督办云南矿务大臣的唐炯（字鄂生）告老还乡，和原在四川万县做武将的于德楷（字仲芳）也退伍回黔。二人回到贵阳以后，他们注意到不少道地中药材市上很难见到。不仅人参、鹿茸等“关外货”和犀角广香等“南药”难见到，就连淮山地黄等“淮药”以及川芎、川贝、川黄连等“川药”，市上卖的也非常少。堂堂一个省城，竟无一家药材品种齐全的商号，实为一大憾事。二人深感地方落后，良医难找，良药难寻。于是，便决定合伙开办一个经营中药的商店。于德楷提供了他家在正新街的房子做店房，地址为今天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处，于家院墙的后面紧接铁局巷。当时，铺面 4 间，铺后是两个院落及厢房，院中有井，井水供

洗、泡药材用,后院的厢房就作库房及加工房。据于德楷之孙于善甫回忆,当时那地方面积是现今同济堂面积的3倍。

唐、于二人给药店起名“同济堂”,意即共同济世活人。开创基金共白银4000两,其中于氏入资600两,这股叫做“本记”,唐家的股份分成三股,就是:①曾记,有银1500两,归唐炯大哥唐焯名下。因为此股金额最多,民国以后,唐焯之孙唐尔锷(字省悟,1877~1939)当了许多年的同济堂经理。②龙记,此股白银1000两,为唐炯长子唐我塘、长孙尔铭享有。唐尔铭字茂宏或梦虹,清朝时官至三品顶戴直隶候补知府。抗日战争开始后吴鼎昌来黔主政时,唐任安顺行政督察专员兼安顺县长。没有多久,弃政还家,做了三年同济堂经理(1939~1942年)。③福记,此股800两白银,为唐炯么房夫人生的三个儿子所有。抗战胜利后不久,此股中的大半被抽走用于所有者的子女在省外念书。最后,还有一股,叫“子记”,100两银,为唐、于二东家从湖北省汉口聘请的中药师黄紫卿所有。

黄紫卿是江西省清江县人,该县樟树镇是我国南方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药师云集,黄氏师出有门,通晓医理,不仅熟悉药性,而且善于经营,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字,其留给后人的笔记《膏丹丸散集成》,今日有的老师傅还曾见过。黄紫卿来贵阳前,是在汉口益康参号做事。唐、于两家给黄紫卿认了一个100两银的“干股”(即黄自身并不出钱),黄年终可凭该股参加分红,黄应聘后,赴江西请人烧制装药的瓷坛瓷罐,购置切、轧、碾、炒药物的各种工具,称药的戥子。在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昌——汉口采购各种药材。又请到几位江西的中药师傅,如黄孔昭(疑为黄紫卿之堂兄)、田么公等人,大小事务一一办妥,农历戊子年(即1888年)吉日,同济堂正式开张。

清朝时候,贵阳“人无三分银”是出了名的,好不容易有一个顾客进到药店,却沿用“要价齐天、还价齐地”的陋习,所愿付的价

格常常低于成本。所以“同济堂”开业后的头几年间,几乎没有有什么生意,以致黄紫卿几次提出要回汉口或江西。于德楷安慰他说:“眼下药店还没有到一个银钱也收不到的地步,假如二天真的到了那步田地,我和唐老爷仍旧会用四乘大轿把你送回江西去。”为了打开销路,同济堂采取了稳定药物价格、改善服务态度、加强店内管理和向名医活动请他们告诫病家将处方交给“同济堂”捡药等措施。针对顾客讨价还价很凶之旧习惯,“同济堂”宣称:我店药真价实,不得还价。在店堂正中挂起一匾,上书三个大金字:“一言堂”,匾的左右还有“货真价实”和“童叟无欺”两块牌子。顾客进店,笑脸相迎,有问必答,店堂内备有长板凳和茶壶茶杯,供人等候取药之用。遇到医师处方上开得有,可是却缺货的情况,从来不对顾客说某味药缺货(旧时,这与信誉有很大关系),而是立即派店员去别家药铺买来补齐,再交给顾客。天长日久,老贵阳人公认,在筑城所有的中药店铺当中,药物品种最齐全以及重量全符处方的,就数“同济堂”这一家。“同济堂”成立初期,全店职工包括从江西来的徒弟端木文元(1877~1932)、杨一清(1879~1941)、黄星芝(1880~1964)等,不过10人,但分工明确,能知道药物的四气(寒、热、温、凉四种不同药性)、五味(辛、甘、酸、苦、咸)、用途用量。归经(说明某种药物对某些脏腑经络的病变能起主要治疗作用)的师傅,大多站柜台与顾客打交道。徒弟们则在另一些师傅的带领下,在3~4年的时间内,从事中药的筛簸拣洗、切铡研捣、飞(加水细磨)刮锉劈、炒灸煨酥、膏丹丸散,他们出师后一般都留在本店,一干就是几十年。像杨一清、陈寿益和黄星芝,就在药店工作了40~50年。

“同济堂”首任经理黄紫卿干了30年,其着清官顶戴(东家给他捐的)的遗像,放在店堂后室的天地国亲师牌位上,一直存放到50年代。看来,人们忘不了这位开拓者。黄紫卿的儿子没有从事中药业。黄死后,唐尔锷当“同济堂”经理。那时贵阳已有报纸,

他重视信息。有一年,唐尔锷在报上看到江浙一带闹水灾的消息,联想到该地区是杭菊花的主产地,次年杭菊价格必然要涨。便叫伙计用高于市价 20% 的价收购了 5000 包杭菊。次年,市面杭菊脱销,结果“同济堂”赚了一笔大钱。抗日战争时期,唐尔锷、唐尔铭等负责人经常根据报上登的国土沦陷或收复的消息,判断药材及中成药产销的流向及药价涨落的行情,及时买进卖出。民国 32 年,唐继善挂名作“同济堂”经理,因为他是搞工程技术的,不久就把经理之职交给其兄唐普善。唐普善一直当到 1950 年。

唐尔锷、尔铭、普善诸位,并不是每天都到“同济堂”视事,而是每隔几天去药店打个转,只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为了切实管住、管好“同济堂”,他们在资历深的职工中挑出了两名作正副管事,分别管内柜房(其职能是记帐和管现钱)和外柜房(职责是外购药和登门市的帐)。内柜房管事或“总管”一职,本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中的 10 多年,是杨一清做。杨业务熟,但爱喝酒,因而一度(民国二十年前后共 3 年)被唐尔锷换下,改聘杨的师兄端木氏当“总管”。端木青年时曾一度从军,民国二十一年病逝后,杨一清的徒弟曾仁昌担任外柜房的负责人。从 30 年代中期到 50 年代中期(公私合营以前),曾仁昌、黄星芝、胡鑫德数位学徒出身的师傅当“总管”。40 年代后期,曾仁昌离店外出做生意,50 年代以后,黄调到市药材公司坪子仓库,胡调到中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民国以后,“同济堂”开始请人印制专用的包药纸,纸上印着药名、性味、功能。顾客进店后将医生开的处方交给专门计算药价的先生,然后交钱给收款人,等加盖店章后再交给司药员。捡好的药独立分包,由校对师傅逐味查实无误之后才发给顾客。1958 年大跃进以后,包药纸上印有说明和逐一分别包每一种药的优良传统,看不到了。民国 10 年以后,贵阳方有中医师坐堂看病。“同济堂”、“协济药庄”是最早请坐堂中医的。名中医唐积福(字希泽)、方以正、宋北垣、王希仲、陈慎一、杨济民等人,都曾在过“同

济堂”应诊。

在同济堂历史中,30年代有两件事必须提及:就是搬家和被炸。当时,于家认为多年来一直提供同济堂房子,却没有在房地产上得到相应的报酬。于德楷的儿子于子勤找到唐尔锷,说:“房子自己要用。”通知把店址搬离。唐即找到其亲家杨覃生的弟媳(人称杨三太),花了2000块大洋买下了杨三太在正新街的黑羊井交接口处的院落和房子。此宅北面是正新街,南抵大道观(今百货大楼后部),是一座三进的小院落,面积显然赶不上于家老屋了。“同济堂”就只搬迁过这一次,时间是民国24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飞机数次轰炸贵阳。民国28年2月4日这一次来势最凶:共2批18架轰炸机。顷刻之间,繁华的中华路以及省政府一带化成火海。幸好,同济堂只有门市部被炸塌,背后帐房、库房中的帐簿、800元现大洋及牛黄麝香等名贵药均未受损失,由胡元宝、曾仁昌包好钱物,带到唐家花园交给了经理。被炸后,药店立即腾出第二进的房子作营业铺面,同时赶修第一进屋(原铺面)。炸后,政府及工商各界对灾民进行了有限的救济,“同济堂”对正新街的每一家住户,送了1斗5升大米和9块大洋。次年1月,新房子建成,为扩大宣传,药店搞了一个“售药大减价月”,减价率是20%,生意超过了过去。

解放前,“同济堂”职工的福利待遇与其它商店相比,算好的:一是月薪比别家高;二是早饭免费。每天早上9点半至10点,先生们(即出了师的药工)到店,店里有专人煮饭,进店后先吃早饭(那时候是一天只吃早晚两餐饭)。吃完饭就开大门营业,中午不休息,一直到下午5点钟。正班结束,大多数的师傅们就下班回家了。由于同济堂地处市中心,晚上来买药的人仍旧不少,所以半个世纪前就兴上“晚班”。那时还没有电灯,是以气灯和马灯照明。每天都留有两三个师傅,加上在店食宿的徒弟们轮流上“晚班”。一般是上到晚上11点钟才关门。每月逢初二、十六两天,职工要